

海明威在古巴之谜

杨仁敬

美国著名作家厄尼斯特·海明威一生侨居古巴20多年,在那里结识了许多朋友,写出了不少传世佳作。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古巴?他的古巴朋友对他怎么样?他跟卡斯特罗的关系如何?他对古巴革命抱什么态度?

在美国近几年来出版的五六本海明威的传记中,这些问题都找不到答案。有的只谈谈海明威个人的生活,不涉及与古巴的关系;有的偶尔提到他的古巴朋友,对他支持古巴革命的态度则避而不谈。因此,这给充满神话语色彩的海明威的一生,又增添了神秘的气氛,成了各国海明威学者所关注的一个谜。

不久前,有的学者介绍了海明威的老朋友、古巴医生赫勒拉所披露的一些细节。

海明威和赫勒拉医生

约瑟·卢易斯·赫勒拉·苏托隆格是个经验丰富的古巴医生,年已花甲,但身体健康,思维敏捷。他是海明威的亲密朋友和私人医生,与海明威交往近20年。他对海明威的印象记忆犹新。

赫勒拉第一次见到海明威是在西班牙内战的战场上。赫勒拉是第12国际纵队的一员,海明威作为战地记者,在这个纵队呆的时间最长。西班牙内战结束后,赫勒拉由于参加了反对弗朗哥、忠于共和国的一方,1939年被弗朗哥当局在集中营里关了42天,后被判处30年徒刑。幸亏他父亲是古巴一个有影响

的人物,赫勒拉坐了两年监狱以后被驱逐出境,1941年12月6日返回古巴。他便重操旧业,继续当医生。不久,他和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过往甚密。他听说海明威住在古巴,非常高兴,就给他写了信。海明威接到信后立即打电话请他到他家里去。1942年他们第一次在古巴会面。海明威要求赫勒拉和他保持联系,尽量帮助他,赫勒拉答应了。后来,他成了海明威的私人医生和忘年之交。

海明威从1939年至1967年定居古巴,从没间断过。可以说,他在古巴过了大半辈子。虽然他到非洲去了几趟,但他很少到美国去。他的生活和创作在那里有很大发展和变化,大部分时间都不受什么干扰。当时,他作为一个文人,具有很高的声誉,但还没达到后来所达到的高峰。由于他的性格和爱好,他和古巴人,特别是渔民,渐渐有了较深的接触和了解。他自己买了一条船,长年放在港口。他酷爱运动和垂钓,参加了国际划船俱乐部,跟渔民们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这使他养成了一种像古巴人的个性。

后来,海明威经常参加钓鱼比赛,还常常在山区猎手俱乐部露面。他周围聚集了许多朋友,而且越来越多。随着他的作品不断获得成功,他的名声日益提高。但他生活简朴,关系单纯。他往往大部分时间关在家里写作,很少跟别人接触。他不爱出风头,也不想见许多人。他经常接见的只是他为数不多的老朋友。

众所周知，海明威在1952年创作了以古巴老渔民圣地亚哥为主人公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他在古巴的生活达到了高潮。他和古巴人民的接触更广泛了。1954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威望。古巴官方开始注意他，但他不以为然。政府给予他许多挂名职务，这使他接触了各色各样的人。他接受了一枚授予出租汽车司机的奖章，而不是哈瓦那奖章。但他不慕虚荣，他不喜欢奖章这类东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为古巴服务。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罗斯福对日宣战，海明威当天即加入海军。他是美国海军和政府的主要联络人。他的船“拜勒号”装备了机枪和反坦克炮，披上了伪装，出没于古巴周围加勒比海沿岸一带，搜索德国法西斯的潜艇。他受到政府的器重，又成为罗斯福总统的朋友。后来，他又被纽约《柯利尔》双周刊聘为记者而到英国去，1944年参加了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的登陆战。他虽是一名战地记者，实际上却像战士一样冲锋陷阵。他加入一个战斗组，冲在大部队前面，搜集了不少敌人的军事情报。战后，他带着更多的伤疤和创伤回到了古巴。美国政府授予他一枚青铜星奖章，表彰他的英勇精神。他穿着一件轻便上装去美国大使馆领奖，当地报刊怪他穿了脏上装去，其实不然。原来是他赶路出了汗，他的上装放在汽车里并没穿。不过，他从不炫耀自己的本领或才华，更不看重荣誉。他得到的诺贝尔奖章曾丢了好长时间，赫勒拉急着帮他寻找，他却无所谓地说：“别管它，丢不了！”结果丢了近两年，到古巴革命时才找回来。

对于古巴问题，海明威曾考虑一段时间。当然，像在西班牙一样，他总是倾向于民主一边。在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时期，当地军警企图搜查他的田庄，遭到他的拒绝，后来一个中士开枪打死了他的猎犬，引起了公

众的义愤。肇事者是当地警察的小头目。古巴革命初期，群众曾要求把这家伙处死，但没有执行。每当海明威遇到麻烦时，赫勒拉等古巴朋友常常去看他，跟他聊天，谈论每日新闻。赫勒拉每周星期三都去，还到他家里度周末。有时几个朋友在一起听广播，汽车进进出出，直到深夜，引起了独裁政府的怀疑。他们以为海明威和他的古巴朋友在搞什么阴谋，其实并没有。他们不是政治集会，而是在听电台广播，议论报刊的消息，谈天说地，交流感情。

赫勒拉认为海明威在古巴生活的后期是挺有趣的。他对古巴革命抱着真诚支持的态度。他十分同情卡斯特罗本人，关心古巴问题的解决。他和马修斯交谈，认为卡斯特罗如果失败，古巴除了恢复旧制度，别无出路。这方面，人们了解不多，对海明威的热情没有加以赞扬。1959年冷战时期，有些人对此感到不舒服，甚至毫无根据地指责海明威。这是很不公正的。

赫勒拉始终把海明威作为自己的亲兄弟看待，海明威对他也很敬重。他非常了解海明威的脾气。他记得，海明威情绪不好时，很少跟大家争吵，也不爱多说话。他心情不佳时就决不外出，只呆在家里喝酒以振作精神。不过，有些报刊夸大了海明威的饮酒习惯，并说他喝得太多，因而得了肝硬化。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海明威并不是酒鬼。40年代末，海明威一度嗜酒成性，影响了写作。赫勒拉严厉批评了他，并给他写了一封信，要求辞去他私人医生的职务。海明威回信表示歉意，赫勒拉很感动，决定继续为他效劳。

海明威在50年代中期患过一次肝炎，曾卧床养病3个月。外界都不知道，因为有人到瞭望田庄走访时，管家里纳总是说海明威不在家，把客人打发走。在这期间，海明威对酒量严加控制，每天下午和晚上各喝一次威士忌，每次一盎司。这个时候，他只允许

几个密友接近他。赫勒拉就是其中之一。

赫勒拉觉得他和海明威的友谊是在战火中结成的，所以是牢不可破的。1936年12月底，第12国际纵队医疗队长伯纳德·海朗叫赫勒拉开车到首都马德里的佛罗里达饭店，去接一个想来纵队采访的美国记者。赫勒拉受命开车去了，但接来的不是海明威，而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玛莎·盖尔虹。她受纽约《柯利尔》杂志派遣到国际纵队采访。赫勒拉把她接回国际纵队医院，当时医院又当临时招待所。海明威也住在佛罗里达饭店。他受北美报联的委托，准备拍摄记录片《西班牙大地》，以唤起美国人对西班牙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赫勒拉开车去接他时，他恰好到马德里南方的前线去了。他回到饭店时发觉玛莎走了，非常着急，几天以后便赶到纵队医院跟她相会。那时他俩正在热恋着呢！从此以后，他就把纵队医院变成他采访活动的司令部，呆了近一个月。他后来得意地宣称：第12国际纵队成了他的家。

海明威大部分时间跟纵队的战士在一起，有时外出办事。他对西班牙共和国方面虽然有些不同看法，但态度是真诚的。他坚信人民斗争的正义性并给予热情支持。有人批评他，主要是因为《丧钟为谁而鸣》中的某些描写。为此，赫勒拉跟他争论了几次。他认为这是一本既不艰深又很艰深的小说。他和海明威都觉得，读者并没有正确理解它。有的把它作为美国青年乔丹的冒险故事；有的认定它是一部战争小说，还有人觉得它是对西班牙各政治派别的攻击。这些看法都不对。这部小说有更深一层的含意。它不仅仅是描写内战的插曲。它反映了西班牙内战对海明威的影响。他以小说的形式来表现这场战争，有时像新闻故事，实际上小说倾吐了海明威对西班牙人民的真挚感情。

在一次反击意大利帮凶军的重大战役中，纵队取得了胜利。海明威到战斗最后一

刻才赶到现场拍了许多照片。（这些照片后来挂在瞭望田庄他家里。）他在纵队呆了几天，与战士们一起踢足球，进行休整。后来他便到前线其他地方去。

过了不久，海明威又来纵队，准备回美国去试映《西班牙大地》和写完小说《有的和无的》。临行前，纵队在医院举行了盛大宴会。纵队的高级官员和跟海明威一起拍片的工作人员都出席了宴会。有趣的是海明威太兴奋，多喝了一点，不久便酩酊大醉。有些官员抬着他笨重的身体走进手术室，把他放在手术台上，四肢都扎好，然后套上手术服和面具，准备了手术工具。医生正要给他打麻药进行剖腹时，他醒过来了。他风趣地对赫勒拉说，他梦见给法西斯抓住了，刚要将他斩成两半。

在攻打休斯卡战役中，赫勒拉和海明威又见面了。海明威看到纵队司令匈牙利人卢卡斯将军上前线，不幸被一颗炮弹击中了他们的汽车，卢卡斯和司机当场牺牲，戈斯塔夫受了重伤。后来在攻下特鲁尔时，海明威又露面了。他经常参加最重要的战役。可惜过了几天以后，他又上前线去，与赫勒拉失去了联系。

但是，赫勒拉一直记挂着他。他记得有一次海明威跌破了头盖骨，鲜血直淌，只好用钳子夹住，幸亏赫勒拉的哥哥罗伯特·赫勒拉用止血带帮他包扎起来，救了他一命，使他平安回到家里。赫勒拉为他处理伤口时，建议他用点麻醉剂，他拒绝了。赫勒拉要求他平稳地躺着，绝对不能动。搞好以后，海明威还是不敢动。赫勒拉问他：“你干嘛还不动？”他回答：“我在等你下命令！”

海明威最后一次离开古巴时，心里异常烦闷。往常他出国时，总是给赫勒拉写信。这回却杳无音讯。赫勒拉想起40年代末海明威在瞭望田庄曾遇到许多困难，特别是有一次与家人发生了痛苦的争吵以后，他失望地

离家出走。赫勒拉记得海明威曾对他说过想自杀，便担心他不能自制，立刻给他写了一封信，表示安慰和鼓励。信中说，他跟他一样，度过了不眠之夜。他非常了解他的忧虑和痛苦。不过，他认为海明威是个天才，已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但应该与自我作斗争，克服“自我”所带来的失望情绪，把他丰富的想象力引向积极的方面，这样就可以获得感情上的恬静，千万别让失望情绪给压倒。他没有权利毁灭自己的才能，而应该充分利用它，给人类留下宝贵的遗产。他不能让消极情绪把自己拖向深渊，而应该勇敢地跟“自我”作斗争，建立与自己身份相称的精神。

“勇敢些！厄尼斯特，你就会战胜一切困难！想想你自己的身份！想想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物！别忘了你的儿子们是多么为他们的父亲自豪！想想与你同甘共苦的妻子！她把一切爱都给了你，为你献出了一切。想想你的朋友吧！他们对你一片真诚，为你感到骄傲！想想你的未来吧！它将带给你光辉的前景和无比的幸福。不过，只要走错一步，一切希望都会落空。好好想想吧！厄尼斯特，再一次控制你自己的感情，热爱生活，热爱妻儿，珍重自己吧！”

赫勒拉真诚感人的信终于打动了海明威的心。3天以后，海明威给他打了两次电话。第三次打电话时，他对赫勒拉说：“请原谅我！”

“费奥，我是个十足的混蛋！我是婊子养的。确实是这样……我在等你，请快来，我求你。”

这封意义深远的信曾有过一番曲折。赫勒拉对古巴学者坎尼尔说，海明威夫人离开古巴时曾把这封信还给他，但他在自己保存的信件中找不到。苏联记者巴巴洛夫引用了这封信的俄文译文，但没注明出处。坎尼尔会见赫勒拉时问起此事，赫勒拉对巴巴洛夫

的研究印象很深，而且跟他合作得不错。不管怎么说，上面摘译的是按俄文本译成的英文，原信是用西班牙文写的。海明威喜欢保存朋友的来信，决不乱丢。他跟赫勒拉一样，爱收集邮票。过了几年，他的床上往往摆满了许多保存完好的信件。当然，那张床他从来没睡过。他这个人乱中不乱，知道谁的信放在哪里，但别人是不清楚的。这反映了海明威和赫勒拉的相互信任和深厚情谊。当时，赫勒拉是海明威家的常客，海明威还特地给了他一把他家的钥匙。这种特权是任何人所没有的。他们两人的交情便可想而知了。

海明威与卡斯特罗

根据赫勒拉医生的回忆，从1955年“7月26日运动”开始，他就不断把古巴革命进展的情况告诉海明威。海明威和卡斯特的联系和见面也是由他安排的。因为赫勒拉在大学时代就是卡斯特的同窗好友，两人很长时间同住一座公寓。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赫勒拉成了卡斯特罗政府卫生部的官员，因此，他是海明威了解古巴的信息来源。比如，在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的过程中，赫勒拉曾告诉海明威：卡斯特罗和他的支持者从古巴东部的斯拉梅斯特拉山区出发，搞过一些秘密的爆炸。赫勒拉还暗示反对巴蒂斯塔运动的人曾在海明威家里开过几次会议。这些活动也许被独裁政府的军警发觉，所以他们在1958年8月突然搜查海明威居住的瞭望田庄。

一天深夜，人们都熟睡了。一伙武装军警用枪托猛击瞭望田庄的前门。海明威被惊醒了。他去开门时便知道情况异常。他发现门外一个中士带了5个武装士兵，问他是否见到两个可疑的农民。海明威看他们来势汹汹，用心不善，喝得醉醺醺的，手中又提着枪，便沉着地告诉他们屋里没有外人。这时，

海明威强壮的小猎狗“马沙柯斯”冲进卧室，对着军警吠叫，中士拿起枪对着猎狗开火，猎狗应声倒地，鲜血直流。海明威尽力克制自己，以防不测。军警们骂了几句就溜了。天亮以后，海明威把他心爱的猎狗埋在游泳池旁边，并竖了一个标记，然后鸣枪致哀。据卡洛斯·贝克在《海明威的生平故事》中提到：这条狗是1948年海明威从美国爱达华州带到古巴的。它一直是海明威的忠实伙伴。

猎狗的遇难，使海明威感到古巴形势的严峻。他的写作受到严重干扰。妻子玛丽劝他飞往纽约，可是他到了纽约，心情更坏。后来他只好返回古巴，但深居简出，很少露面，也几乎不去海边钓鱼。

事实上，海明威对1952年搞军事政变上台的巴蒂斯塔总是保持一定距离。巴蒂斯塔曾想授予海明威卡罗斯勋章，以此巴结他，但海明威并不给他赏光。有一次，巴蒂斯塔要为山区狩猎俱乐部剪彩，作为俱乐部著名成员的海明威却拒绝参加剪彩仪式。当巴蒂斯塔逃往多米尼加共和国时，海明威估计这个暴君带走了8亿美元和50箱贵重物品。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这个婊子养的家伙就这样完蛋了。”

巴蒂斯塔对海明威的不友好的态度使海明威对古巴革命产生了真正的兴趣。尽管有人误解海明威，甚至指责他对古巴革命抱着资产阶级颓废的态度。赫勒拉坚持认为：海明威直到去世以前仍然是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的支持者。他的看法得到了另一个在西班牙内战中结识海明威的古巴人赫伯特·马修斯的证实。

1960年3月13日，马修斯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厄尼斯特·海明威仍然是古巴人民的伟大英雄。他正呆在家里辛勤地工作，以表示对卡斯特罗革命的同情和支持。他了解古巴和古巴人民，像任何美国公

民一样。我很高兴地发现他对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的看法跟我一样。”

1958年下半年，古巴革命出现了危机，海明威回到爱达华州凯特秋姆故居休息。同年12月下旬，他感觉好一些，又开始像往常一样给赫勒拉寄圣诞卡表示良好的祝愿。海明威在美国经常听电台广播，注意古巴革命的消息。巴蒂斯塔逃离古巴以后，海明威打电话给赫勒拉说：“革命得救啦！为革命尽力而为吧！”

在那一次电话中，海明威还向为他代管瞭望田庄的管家里纳·维列里尔和所有古巴人祝贺革命胜利。里纳说，海明威当时又高兴又激动。当海明威问他瞭望田庄的情况如何时，里纳说，支持革命的地方武装支队来借武器。海明威回答说：“他们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把所有武器和弹药都给他们。”他还补充说：“如果他们需要那栋房子，就让他们用，把车子也借给当地革命负责人用。”结果，里纳一一照办，借给了当地司令员10支来福枪和手枪、一支左轮枪和全部子弹。几天以后，里纳又向海明威报告说，革命者借去的东西已如数归还。那个开枪打死猎狗的中士被绑在电灯杆上示众了。海明威听了会心地笑了。

海明威对古巴革命进程十分关心。1959年3月18日威廉斯上校的葬礼以后，他给瞭望田庄又打了电话，当他听到这个革命起义领导人牺牲的消息时，难过地哭了。但里纳告诉他：赫勒拉被任命为革命军的医疗处顾问。他另一个好友波菲奥被任命为省政府成员。海明威听说他的好朋友参加了新政府，显得格外兴奋。他答应立即赶回古巴亲眼看看所发生的变化。果然，一个月内他就返回瞭望田庄了。

在古巴革命胜利初期，美国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抨击古巴，尤其是卡斯特罗第一次访美时，遭到美国舆论界的猛烈攻击，指责他

审判和处决了巴蒂斯塔的亲信们。海明威大胆地站出来说话，批评这场诽谤运动。他为一家地方报纸写了一篇文章，指出报刊上所说的古巴血腥的清洗是不真实的。据他了解，古巴革命政府所处决的人数远不如遭到巴蒂斯塔杀害的人数。他不仅在报刊上著文，而且还录音送给当地电台广播。不过，一些报业托拉斯压制他，各大报纸都不转载他的文章。几天以后，他带着这篇文章回到古巴，并把它送给卡斯特罗。卡斯特罗首次在电视台上露面时，曾向观众出示了这份报纸，并加以赞赏。

海明威和卡斯特罗并不是好朋友，但卡斯特罗经常赞扬海明威，不仅在这个时候，而且在他掌权的所有时候。早在1949年，他们两人在德比时就一起钓过鱼。卡斯特罗真想到海明威家里去跟他谈谈，并了解他。他常说：“听着！我希望你会带我到那儿去，我要了解他。我很有兴趣跟他交谈。”所以，赫勒拉几次对海明威说：“我想带个朋友来找你，他了解你。”不过，卡斯特罗当时忙于大学的各种政治活动，他们一直没法安排约会。直到1960年5月16日，他们才一起钓鱼，互相认识。他们交谈了半小时。海明威把一年一度的钓鱼奖颁给卡斯特罗，以表示友好。

1960年9月，卡斯特罗打算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海明威知道这个消息后，担心美国报刊又会找卡斯特的麻烦，就设法与卡斯特罗接触。赫勒拉尽量安排他们二人在卡斯特罗动身前见面。海明威对赫勒拉说：“他的访问一定要成功！”可惜卡斯特罗太忙不能赴约，改派他的高级新闻官员瓦斯奎芝·坎德拉去拜访海明威。赫勒拉开车送瓦斯奎芝去瞭望田庄。海明威带枪会见了他们。瓦斯奎芝原以为海明威这位举世闻名的大作家恐怕很傲慢，可他一进门就发现海明威热情友好、亲切和蔼，很想尽力帮助他们改善处境。他们三人坐在沙发上谈天喝酒，欣赏贝

多芬和巴赫的名曲，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海明威最关心的是垄断财团所控制的报刊可能会给卡斯特罗制造困难。他请瓦斯奎芝向他的同志们转达他的问候和支持。

海明威从纽约回到哈瓦那机场。当记者问到他古巴革命的看法时，他对美国的态度感到遗憾，他觉得他自己是个地道的古巴人，并不想当个“美国佬”。说罢，他弯腰吻了古巴国旗，这使在场的许多记者和摄影师大为吃惊。海明威好像看出了他们的心思，又挥手说：“我说过，我是个古巴人。”

在古巴革命过程中，海明威一直住在古巴。他了解革命的准备情况，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如果他不是突然自杀的话，他可能会在古巴待到去世为止。

关于海明威在古巴的生活经历，特别是他对五六十年代古巴革命的热情支持，目前详细加以论述的专著还没有。被公认为权威学者的美国卡洛斯·贝克教授在《海明威的生平故事》一书中曾提到：“海明威夫妇尽量不介入古巴的政治。”他没有充分考虑海明威和他的古巴朋友赫伯特·马修斯以及跟古巴革命的关系。这显然是欠客观的。

因此，加拿大学者布拉斯茨建议美国批评家们尽早摆脱美国政府和美国报刊希望古巴政府垮台的偏见所带来的影响，写出一部准确反映海明威在古巴的真实传记。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但是，目前进行这个工作，困难确实不少。由于古巴气候的关系，海明威图书馆的藏书受到很大影响。海明威的古巴朋友和知情人年纪都挺大了，不久将逐渐离开人世。赫勒拉仅是海明威许多古巴朋友中的第一个。他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宝贵资料。1970年11月28日，古巴青年学者菲力帕·坎尼尔曾去访问过他，并用西班牙文做了记录。

（下转第200页）

莫拉斯夫妇不再出声，只是端详着三视镜中伊冯娜三个不同角度的身影。他们在考虑，怎样才能不失面子地走出商店。他们试了衣服，心里也明白，要买的话，不仅仅是发疯，而且也是办不到的。

“你觉得怎么样？”莫拉斯怯怯地问道。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

“你们是否要想一想？”售货员扔来一句话。她知道试衣服该怎样收场。

“是这个意思。”夫妇俩同声说道。

他们回到家后，算来算去，这个月是买不起了，因而一再感到惋惜。

“过一个月，过一个月就是圣诞节了。对，到圣诞节，”莫拉斯先生说，“就是多付出一倍的钱，我也包你能穿上。”

“亲爱的，”妻子握着他的手说，“到那时穿就太冷了。不用了，谢谢你。衣服是漂亮，可不实用。”

连衣裙被遗忘了。一天晚上，离圣诞节只有几天了，伊冯娜·莫拉斯在桥边的岔路口遇上了车祸。他丈夫受到这意外的打击，在医院里受害者的房间里跪了两天。谁的话他也不听，或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直到第二天晚上，要装棺材了，莫拉斯才出了医院奔向时装店。女售货员还没来得及跟他讲上一句，他已经脱下了模特儿身上的连衣裙。

(上接第194页)

1971年初加拿大驻哈瓦那大使馆职员卢列尔·格列汉姆又去访问他，并写了一篇研究报告。第三位是苏联常驻古巴的官方记者尤里·巴巴洛夫。他在1974年回苏联后，由苏联作家协会出版了《海明威在古巴》一书。第四位就是前面提到的加拿大学者布拉斯茨。他于1984年2月访问了古巴的海明威学者玛丽·克鲁兹和古巴作家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安格尔·奥基尔博士。他们向他详细介绍了赫勒拉医生对海明威的回忆。这些资料已陆续整理发表。如果各方面的材料能进一步核实

他取出一叠钱付款，顾不得取回找头就走了。他刚好来得及把裙子穿在躺在棺木中的妻子身上。伊冯娜长着一个鹰钩鼻，他以前都没注意到。她高高的颧骨，身上的肌肤是灰黄色的，跟开罗街上蜡制模特儿的颜色一样。当莫拉斯把毛领套到死者头颈处时，自以为在他妻子的脸上看到了一丝笑容。他站起身来，看看帮忙抬棺材的人，看看他们的手插钻和螺丝。突然，停电了。一个帮忙的人打着了打火机。电又来了。棺材被抬进了教堂。莫拉斯的兄弟在半夜时赶到了。医院里的一名修女把他拉到一边。

“设法让莫拉斯先生吃点东西，”她说，“把他带回家，明天葬礼时，让他穿整齐点。”

弗朗西斯一一依从，只是跟他兄弟说让他在回家前再到城里走一走。他路过巴黎女装店时，停了下来。

“他们让橱窗里的灯整夜都亮着，”他的兄弟没话找话地说，“可亮堂堂的橱窗里却是一个一丝不挂的模特儿。你们这儿的人可真怪。不对！请原谅，我没留意。这是件艺术品，你们的橱窗设计家真会出新点子。”

他笑了。莫拉斯却觉得泪水涌上了眼睛。在橱窗深处，一个女模特儿光着身子向一个男模特儿伸出双臂。男模特儿穿着晚礼服，背朝大街，向女模特儿举着一件连衣裙。

和充实，为海明威在古巴提供一幅准确而真实的图像，并就他对卡斯特罗革命的态度作出公正的评价，这将大大有助于全面了解海明威的一生、他的性格和思想倾向。

尽管眼下困难重重，但这个问题已引起各国学者的兴趣和重视。古巴的海明威学者在抓紧工作，美国和加拿大的学者也纷纷到古巴去追寻海明威的足迹，参观海明威的故居，搜集第一手资料。如果各国学者能通力合作，交流信息，那么，真正揭开海明威在古巴之谜也许为期不会太远了。